

日本的教育

〔日〕小林哲也 著
徐锡龄 黄明皖 译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外国教育丛书

日本的教育

〔日〕小林哲也 著

徐锡龄 黄明皖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 北京

外国教育丛书

日本的教育

〔日〕小林哲也 著

徐锡龄 黄明皖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衡水地区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87,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书号 7012·0454 定价 0.65元

编者的话

为了帮助我国教育工作者了解外国教育的情况和经验，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借鉴，我们编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本丛书按照我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并根据搜集到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拟定选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他们把发展教育与促进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认为人的“智力开发”在于教育，“国家实力的较量就是教育实力的较量”。本丛书过去曾经介绍过日本的一些教育情况，但是不够系统，或者偏重于某个方面。

为了比较系统地介绍日本教育的情况，我们出版《日本的教育》一书。本书系日本京都大学小林哲也(Tetsuya Kobayashi)教授著，原书是用英文写的，书名为《日本的社会、学校和进步》(Society, Schools and Progress in Japan), 1976年版。本书介绍日本教育的简史、国民教育原则和制度以及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由于本书是七十年代初期写的，书中只谈到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教育。为了使读者了解日本七十年代的教育情况，我们编入了《七十年代日本教育概况》一文。这篇文章是根据日本文部省大臣官房调查统计科1978年出版的《日本教育图解》一书(英文本)的资料编译的。还刊载了根据日文资料编译的《日本教育大事记(1945—1978)》，以便读者查阅。

《外国教育丛书》编辑组

1981年7月

目 录

原 序	1
第一章 进入现代期以前的日本教育	3
第二章 进入现代期的日本教育	23
第三章 国民教育原则	46
第四章 教育管理	60
第五章 教育与经济的发展	78
第六章 学校与社会	95
第七章 国民教育制度	109
第八章 七十年代的日本教育	132
专词英中文对照表	154
译后记	160
七十年代日本教育概况	陈再绅 曹根旺编译 161
日本教育大事记 (1945—1978)	刘直率编译 206

原 序

本书是希望向读者介绍日本国家教育特点而编写的。它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历史部分,共有两章,目的是使读者了解从古代到约1950年的日本教育史。日本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自己的文化特点,著者相信介绍历史的这一部分是全面理解日本教育所必需的。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共有五章,每章都力求论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日本国民教育的某一个方面。最后部分论述七十年代初期的教育,目的是向读者提出有关日本教育前景的一些见解。全书自始至终,都试图对日本的社会进步,同日本有组织的教育措施,特别是学校措施的相互关系,作出有分析的阐明。

在这本书里,如果自认已将日本的所有教育问题都提到,并作了面面俱到的论述,那就未免过于冒昧了;但是,著者希望这本由一个日本人写出来的书,能够给非日本人的读者提供解答。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著者承蒙许多人帮助,其中铭感特深的是下面提到的几位:本丛书的总主编金·晏文士教授(Professor Edmund J. King),给予著者以编写这本书的宝贵机会;刁本杰明博士(Dr. Benjamin C. Duke)曾读过初稿的一部分,并提出意见;格罗特夫人(Mrs. Anne Freifrau Grote)曾校订著者的英文手稿与打字。

本书的编写是著者在汉堡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主任时已开始,并且完成了主要的部分,因此,著者乐意贡献这本书给当年同在教科文组织工作的许多朋友,作为愉快友情的纪念。

小林哲也 哲学博士 于日本东京
京都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
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主任(1968—1972)

2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第一章 进入现代期以前的日本教育

国家最初形成时期的教育

日本由四个大岛和几百个小岛构成，在亚洲的东北岸，由北而南地伸展，成为一个弧形，长达1,500英里。这一地理位置，就整个历史来说，对这一国家的特色及其文化，发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国家初建时期更为确实。因为它有岛国性，人们常把日本与英国对比，英国是欧亚大陆遥遥相对的另一边的一个岛国。这两个国家都因受到大陆上一种优越文化的影响而在历史上出现，从而互相辉映。

就日本来说，这一优越文化来自中国。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秦朝与汉朝，古代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中国文化对日本当地文化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延续到几个世纪。造成缓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的岛国性。朝鲜海峡是通向大陆的最短的通道，它广达110英里，比多佛尔海峡还宽4倍。古代航海技术还很原始，这样的宽度便足以阻挡大量的文化袭入，而只容许来自大陆的逐步的影响。因此，一直要到公元后四世纪，中国文化对日本岛国的影响，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前所未知的优越武器与工具，这些帮助日本由原始社会变为一个较高级的社会，这个社会权力集中，并具有掌握新文化的便利条件。到了四世纪，日本已经走向政治统一，而现在皇朝的远祖，力图在这一过程中树立起对地方部落的统治权，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来到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便终于完成了。

这一进程也得到中国文化的另一些因素的助力，其中最显著

的是文字,中国的高级学术与佛教。这些因素给政治首领们提供了巩固他们统治的工具。把中国学术文化带进日本的第一次官方记录是:公元513年一位熟谙中国经典的朝鲜学者对皇室进行了访问。稍后,另有一位朝鲜学者前来皇室教了一段时期的中国经典。公元552年,朝鲜一个传教团带着佛像与佛经前来。这些只是中国文化洪流通过朝鲜传进日本的几个事例。本来,日本可以在更早一些时间来接受中国文化的。日本统治者接受这些中国文化的要素,既看作他们权力的象征,又作为他们统治的一项工具。

第一个试图按照中国模式来组织政府的是孝德王子。他年少时从皇室的一位朝鲜学者学习过中国经典与佛教。当他任摄政王职位期间(593—622),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僚属负责的政府来取代旧有的松弛的部落联盟,因此想到要取法中国。到603年,一个有12个社会阶层的等级制度建立起来了,它实行考绩授官,这是来自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理想。

他的《十七条宪法》是604年颁布的一整套训令,包括几种中国经典的引文。这表现出他是笃信中国学术的。608年他派遣一批年轻学生与僧人到中国求学,当时中国是由隋王朝统治的。其用意显然在于学习中国经典和佛经作为新政府的基础。他自己就在学术研究上花了大量时间。他把新建的圣殿命名为“学宫”,表明那是他求学又是他施教的场所。据史书记载,他常宣讲佛经,同时鼓励宫廷少年向朝鲜学者求教。

他在政治上是不是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政权,那是一个疑问,不过我们的意图,只是指出,由于同中国学术文化的接触,日本在这个政治上建国伊始的时期内,开展了大量的教育活动。这些替新文化培养青年一代的教育活动,并不要等任何有形的教育制度的出现,就已经先出现了。这个便同人们在较后时期所看到的中国政治与教育制度发生主要影响的情况,显然有别了。

645年的“大化革新”在日本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皇室对世袭的部落享有盟主权。这一改革是由摄政圣德太子(他后来

成为天智天皇)与中臣镰足领导的。这两个人都曾跟南渊性廣学习。南渊性廣是当年由孝德王子派遣去中国的使团的一员,他在中国学习了32年。同他一起到中国学习的学生有(僧)旻与高向玄理。后来他回到日本,授予“国家博士”。毫无疑问,“大化革新”的首领们力图在他们的领导下,按照当年唐代中国的模样,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一夺得政权立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法律体制;这个体制要经历半个世纪才能完成。

701年的《大宝律令》,事实上是初期法典的发展,显得不完备,因为它只是盲目地采用了中国的法典。重新修订了的《大宝律令》,虽然原则上还是中国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地方的需要。它包括有12个刑事法令与30个管理规则的法令,教育法令是后者中的一项。

《教育法令》包括22章,它按照中国的模式,说明国家教育制度由中央太学与省学构成。太学有两项职能:一方面,它是道德教育的中心,奉祀孔子,从这里把孔子关于政府与道德的教义传播给政府官员与全国人民;另一方面它又是未来官僚的养成所,他们以掌握儒家关于政府与道德的教义为首要条件。

七位博士与助手们,依据儒家史籍与儒家哲学和法则,以及掌握中国文献所需的阅读与写作的基本技能,进行教学。从政府官员的儿子中挑选13至16岁的400名学生。通过考试后,学生便被推荐去任政府的官员。

在每个省,设一所省学来招收省内官员和上层人士的儿子。学生人数随各校的大小而不同。学生跟一位“省的博士”来接受跟太学类似而水平较低的教育。

《教育法令》的根本思想是在从那些按能力、挑选的有为青年里培养政府的官员,用从中国传进来的治国的新知识与能力教育他们。

但是,按能力挑选青年人的想法,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所以,这些学校只是给省内政府官员与上层人士的儿子而开设的。而且

给高级官员的儿子还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能够合法地免试任职。显然，这是新政府为了世家、部落要占有政府职位的世袭权利而作出的妥协。

尽管这样，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事项：在第一次建立学校系统当中有三个明显特点。这三个特点在以后的多数学制里还保留下来，因而它们也成了日本学校的几乎是固有的特色。这三个特点是：第一，学校是由于政府培养国家所需人员而建立的；第二，从个人来说，学校给有志青年开辟了一条取得社会成就的门路；第三，学校讲授新的外来文化的基础知识，从而使学校变为“文化交流”的一项有效工具。

为古代贵族们办的教育

经历了大约三个世纪的中国化的过渡时期，接着便是一个调整的时期，那时土生土长的日本文化，吸取了传来的中国文化，从而把自己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大约从九世纪的末年开始，不再向中国王朝派遣官方使节。当时唐朝濒于没落，大陆上的变乱使得官方使节往来有困难，也使得日本的统治者对此不再感兴趣。

同中国官方往来中断，并不意味着同中国文化完全隔离开来：在大陆与日本群岛之间，商船还是继续往来；僧人和学生以个人身分来中国求学，不过他们带回去的文化知识，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发生影响，例如在高深学问的研究方面，或者在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官方交往的中断，给日本提供了两种文化融合的机会，不致过于受到外国的影响，并由此使日本把自己文化特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一情况继续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结束，只是在十六世纪日本外交政策一度倾向于活跃，因而有过一次波折。

文化适应的一个好例证是文字体系。日本话是同中国话完全无关的,并且,正如前文所说,在中国文字约于六世纪传入日本以前,日本没有文字。一直到距今不远的时期内,虽然按古典形式写中国文章的能力还受到尊崇,但日本人从七世纪起已经开始用中国的意符文字写出他们的话来,只采用了它的声音上的效用,而不理会它们的意思。

到了十世纪,一套日本文字已经形成了,汉字已经被简化而按注音效用来使用。这一套注音文字即假名的发明,使得日本人有了一套自由表达与相互交流的方法。从十世纪到十二世纪,日本文学能够繁荣昌盛,同这一事项有关;它还对日本文化的每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事例就是佛教的发展。佛教约于六世纪传到日本,到了八世纪,它在皇室维护之下成为一个国教。

其后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过程,由于佛教首领们努力宣教,使佛教教义切合日本人民的宗教需要,使佛教在日本日趋昌盛。尽管这样,佛教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与信仰,例如,从日本原始生活开始的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和从中国发源而传进日本的儒家学说,以及其它形式的中国文化。佛教与其他宗教在教义上和传播上互为影响,但仍然并行不悖,各自保留自己的特色,从而创造出至今日本仍然流行的一种宗教生活模式:在国家和地区行祭祀时奉行神道教,在玄学与精神问题上奉行佛教,在世俗道德与公共礼节时奉行儒家学说。不过,这只是解说事情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带有陷于过度简单化的严重危险的。

在从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本地文化趋于发展的最初时期,宫廷贵族是社会上当权的阶层,他们从远古部落时代的家族血统关系继承权力。政府高级职位授给大家族内那些重要成员。在这些 people 里,藤原家族由于他们的创始人中流仲富有过功绩的特殊地位,并且由于他们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就使藤原族的家长享有几乎是独有的充任摄政王的权利。

藤原族摄政者不常在政府官署，而在自己的家族事务所处理国政。在那个时期，每个大家族都设有一个处理自己家属事情、首先是处理构成家族经济基础的家族财产的事务所。由于国政的中心已经迁移到藤原族的家族事务所，许多在《大宝律令》中规定的职务就徒具空名了，皇室内官员的角色便只是徒有其名的与礼节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与管理性的了。

最后一种情况使宫廷贵族养成一种特殊文化，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审美准则占重要的位置。人们的好坏，不是按他们的实际能力，也不是按伦理标准，而是按他们在爱好上与行动上的审美品质来判断。能写日本诗，也能写中国诗，能玩一种乐器，这三者被认为是一个高尚人的三项主要技能。女子是跟男子一起参与有文化的生活的，因此，人们希望她们也有这三项能力。

这个时期的教育，反映这时期文化正在经历改变的特点。就国立学校制度的太学课程来说，八世纪中叶已经看到，文学训练受到新的重视，学校中有一位文学博士。到九世纪初期，文学科十分盛行，只好限定，只有那些贵族家庭中最高一层的学生，才能修习该科了。

到了十世纪，出现了太学衰退的现象。高级贵族家庭的儿子，入学并不象从前那么积极。整个地说，学生质量降低。学校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连维修校舍也感到困难了。

产生这样衰落的原因是明显的。《学校法令》取消了高级贵族子弟考试授官的规定。尽管是任命一个小官吏，也常常不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由于家庭的关系。取得政府的职位只要凭藉门荫，谁还要进太学来接受任职训练呢？所以当1177年太学的楼房被火烧毁后，便没有重建，而学校也就不再存在了。

各省学的情况与此相同，而且更糟。《大宝律令》的计划大概过存奢望，而且，依据记载，只有少数学校真正存在。北九州的学校在一个时期曾被认为教学水平高的学校，因为它设在通向中国大陆的门口，但是，到十世纪时，现存记载却找不见它存在的痕

迹了。

同公立学校的衰退相反,这时期私学的兴旺却值得重视。从前,一些大家族为方便本族家住外省的支派子弟来京都太学就学,建立了寄宿舍,这时,这些私学就利用这些房舍开办起来。由于太学已不能为锐志前进的青年保证职位,这些大家族便把寄宿舍改为学校,使本族少年能够接受担任政府职位或者管理本族家产所需要的教育。所以,八至十三世纪之间,我们看见有至少五所私学存在的记载。

武士的教育

十二世纪末年,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取代了宫廷贵族,设立军人政府。这些军人来自各省贵族家庭的家产管理人。当时没有地方警察的制度,他们武装了自己,凭武力实行管理。最后,利用了中央政府的动荡,他们从宫廷贵族的手里取得了政权;他们建立起经历了六个军人家族的军人政府,这个政府从十二世纪末年到十九世纪后期,连续了七个世纪。

在这个军人政府里,产生了特种的教育活动。但是,在军人最初掌权时期的教育,与在较后的德川执政时期的教育,从性质上和形式上来看,是有些不同的。因此,下面将先叙述较早的从十三到十六世纪的教育活动。

这样出现的军人阶级具有与宫廷贵族并不相同的教化。基本上它是不崇尚文治的教化的。虽然文艺武术两者兼优常被认作是理想的文化造诣,但是,文艺技能被看作是次要的。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武士学者或武士文艺家是明显的例外,武士阶级的队伍里大部分是文盲。的确,只是到十七世纪后,武士阶级才变为兼军事与政务于一身的阶级,并且文艺能力才在执行这种新职能中变成需要。在此以前,军人基本上是作战的人,对他们来说,作战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些人缺乏文化。恰恰相反,这些人创建了从道德标准来评价人们行为的一种文化。武士道或骑士精神是到后来才出现的名词。但武士道这一词所包含的种种道德品质,如胆量、勇敢、坚毅、孝义与忠诚,早已规定着这一时期武士生活的准则。获得这些品质并不依赖读书,而依赖家庭、社会,特别是战场上的经验。

负责训练青年人的是家长。现在仍然留存的十三至十五世纪的家族格言,说明了当时进行什么样的训练。此外,一定还有更多的没有写下的教育青年武士的家族信条。

生活在这样不崇尚文治的教化的环境中,在十七世纪以前,除了偶尔设置几所学校或图书馆以外,武士阶级自然不会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体制。前文已经谈到,到十二世纪末年,宫廷贵族已经停止官学与私学的教育活动。在十三至十六世纪一段期间,便由佛教的寺庙来填补设置教育机构的空缺。

从它们最初建立时开始,佛教寺庙具有训练僧侣阅读佛经的功能,因为阅读佛经需有一定的文学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各宗训练僧侣,渐趋系统化和扩大化,包括着世俗文学的基础与深造两个方面的研究,因而在八世纪后僧侣中出现许多文学上的名人。

十二世纪,其他教育机构停办了,佛教的庙宇和寺观却在军人政府的保护下,作为教育和培训僧侣学者高深学问的中心而继续存在,同时开始吸收世俗儿童授予初级教育。佛教寺庙学术活动的最高峰是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当时禅宗的各主要寺庙在中国文学方面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这样延续下去,直至十七世纪佛教寺庙停止了他们的世俗学术活动,把这一职能交给在德川军人政府赞助下新出现的世俗学校来负责。

佛教寺庙实施世俗儿童的教育约从十三世纪开始。由于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寺庙接收各个阶层的儿童。到了十五世纪,较富裕的平民们送孩子到寺庙,同武士阶级的孩子一起受几年初等教

育,这已经成为常见的事了。

市民们在教育史上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社会在十五、十六世纪社会经济的变化,经济活动的活跃,使城市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阶级财富的一项来源,在于十三世纪开始的海外贸易。他们首先同中国贸易,到十六世纪扩充到南洋与西方世界。同后者的贸易,是由富于冒险精神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进行的,通过他们,日本人第一次发现了西方。

这一接触的影响,并不限于日本的经济生活。自从九世纪末年同中国的正式联系中断后,日本文化曾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现在却分别从中国、南洋和西方世界受到进一步的新的刺激。由于与中国的重新接触,十四、十五世纪,尤其是在禅宗寺庙内,研究中国文学盛极一时。

就西方的影响来说,基督教与枪炮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带给日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因素。但基督教的时间并不长,它对日本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影响只是限于地方性的。在教育领域里,西班牙传教士设置了几所教会学校与神学校,但是都没有维持多久。另一方面枪炮却改变了作战的技术,导致了德川集权主义军事政权的出现。德川政权靠优越武器的装备,使得这个国家在经历长时期的政治与军事纷争以后,在十七世纪获得政治上的安定。

德川时期的教育

德川时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保守主义,而这正是德川社会自身的反映。1603年,当德川家康第一次在江户(现在的东京)设置他的幕府或军人政府时,这一政权的首要目标是在国内形成政治上的安定。家康与他的继承人制订一个较完备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一方面保持国内安定达二百多年,另一方面阻挠社会变迁与进步的一切尝试。社会被严格地划分成阶级,每个阶级都要满足

于它的法定的地位与义务。中央的幕府与地方上的藩（封建领土或贵族领地）都设置有强制执行法令的机构。同外间世界的往还，受到政府闭关政策的严密禁止。

从开头起，教育被看作保持现状的最有力的工具，受到家康及其后继人的鼓励。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民同现行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相适应。德川教育的保守主义，明显地表现在老师对学生的绝对权威性，与它的教学上教条主义的特色。作为正式的教义，幕府采用了朱熹学派的儒家学说，它说明了宇宙与人类社会两者间井然有序相互关系。这一政体禁止西方的学术，不仅因为它与基督教有关系，更因为它是标新立异的。

尽管这样，由于他们奖励了办教育，知识的醇种传开了，新思想的学派逐渐发展起来了。到了德川时代的末期，儒家学说中的异端学派，如王阳明学说（日本人称之为阳明学派）与所谓“国学”（日本经典的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就是“西学”也被更广博地研究。德川政府稳定一天，异端的学者便被压制一天，甚至被用来增强他们的统治。但是，当这一统治失去它绝对地位的时候，异端的学者便成为导致1868年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的推进力量。

德川社会的特点是严格的阶级划分和社会变动受到很大限制。人的地位一生下来就确定了。士（武士）成为一个世袭的统治阶级。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按世袭地位来行动和起作用的人。因此，它是以阶级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教育上主要的区别，是武士教育同平民教育的差异。前者给英才们培养统治者应具有的各种品质；后者培养人们成为有能力而又驯服的群众。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教育作为社会变动力量的概念，在德川社会里也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实际上教育是社会变动的途径之一，这种变动虽然有限，但仍旧是重要的，因为有少数人，特别是平民，可能由于成了专门学者、祭师或医师而转到“士”的地位去。这些专业不问什么出身，为有才能的人开放，因而出身低贱而有志气的少年们，有时能够进入这些专业，而且靠着刻苦用功，进行“相当于”